

名家讲坛  
MINGJIAJIANGTAN



王子今 著

明代学者张燾著书《千百年眼》以进行历史总结，据说一时“盛传于世”。作者治史“不必苟同”的风格，是我们深心赞同的。本书作者也是希望于读者一起，通过细心的历史回顾，看中国怎样经历政治史一步步地走来，中国人怎样经历政治史一步步地走来，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怎样经历政治史一步步地走来。

千百年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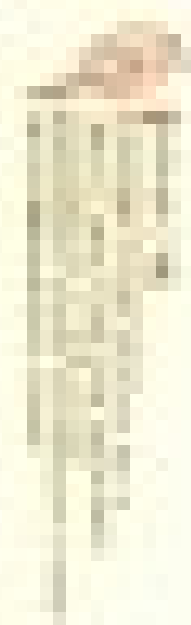
皇权与吏治的历史扫描  
HUANG QUAN YU LI ZHI DE  
LI SHI SAO MIAO

# 千百年眼



長 春 出 版 社

【新闻】



# 千年眼

【新闻】

名家讲坛  
MINGJIANGTAN

# 千百年眼

千百年眼

皇权与吏治的历史扫描

HUANG QUAN YU LI ZHI DE  
LI SHI SAO MIAO

王子今 著

長 春 出 版 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千百年眼:皇权与吏治的历史扫描/王子今著. —长春:长春出版社, 2008.1  
(名家讲坛)

ISBN 978-7-5445-0484-3

I. 千... II. 王... III. ①政治制度-历史-研究-中国-古代  
②文化史-研究-中国-古代 IV. D691 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 第 150656 号

**千百年眼——皇权与吏治的历史扫描**

著 者: 王子今

责任编辑: 张 樱

封面设计: 荀 博

出版发行: **长春出版社**

总编室电话: 0431-88563443
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561180

读者服务部电话: 0431-88561177

地 址: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

邮 编: 130061

网 址: <http://www.cccbs.net>

印 刷: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29.9 千字

印 张: 16.25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4000 册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厂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431-84652148

## 写在前面

钱穆先生说：“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。尤其如中国，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。更其是儒家的抱负，一向看重修齐治平。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，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。”我们虽然并不完全赞同钱穆先生关于“辛亥前后，由于革命宣传，把秦以后政治传统，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”的批评，但应重视他关于“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，自该检讨传统政治”（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·序》）的意见。我们认为，应当在这“检讨”的工作中，真正坚持“平心客观”的历史主义的态度，对于中国传统政治“专制黑暗”的一面，自然也不应当回避。

我们还可以引用钱穆先生的话：“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，这两千年来，在政治上，当然有很多很可宝贵的经验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。”（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·总论》）总结这些经验，揭露这些流弊，是政治史研究者的任务。中国传统行政方式形成的历史秩序是稳定的，有学者称之为“超稳定结构”。如果以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相关政治现象，也许会有重要的发现。“秦以后政治传统”的性质和特点究竟是什么，如果通过行政史若干个案的研究，例如：“忠”的观念作为政治道德规范是怎样定型的，“巫蛊之祸”的历史悲剧是怎样发生的，晚年汉武帝有怎样的政治表现，汉代少年官吏怎样实习行政，他们怎样通过这样的实践逐步进入决策层，汉代开明政论家怎样批判浮侈世风，《资治通鉴》又是怎样一部政治伦理与政治道德的教科书等等，从不同的层次试探说明中国古代皇权和吏治的特质与风格，也会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得到真切的理解。我们进行的工作，还包括通过中国古代政治人物人生表演的扫描，获得有利于探索千百年来行政史风貌的重要信息。以学术述评形式进行的政治史观的讨论，或许也是有益于透视传统政治以及诸种传统政治观的。

明代学者张燧著书《千百年眼》以进行历史总结，据说一时“盛传于世”。作者治史“不必苟同”的风格，是我们衷心赞同的。本书作者也是希望与读者一起，通过细心的历史回顾，看中国怎样经历政治史一步步地走来，中国人怎样经历政治史一步步地走来，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怎样经

历政治史一步步地走来。

那么,进行这样的工作究竟有什么意义呢?

这里不妨借用鲁迅的话作为回答。

鲁迅在谈到清代文字狱的时候曾经说,读史,回视清人行政史中意识形态控制的方式,总结其“驾御汉人,批评文化,利用文艺”等手段,这样,“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,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,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。”(《且介亭杂文·买〈小学大全〉记》)。以“驯扰”两个字总结传统政治史观对人心的影响,实在精当。以“奴性”两个字概括中国国民性的阴暗面,也是合理的。鲁迅这段话中所谓“可以看见”,所谓“能够明白”,提示了我们试图“平心客观地”“检讨传统政治”时,面对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读者们负起责任。

鲁迅的另一段话,也值得我们在回顾中国帝制时代行政史时引为参考:“古国的灭亡,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,不再能够转移,来适应新环境。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,于是变性,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,不妨妄行。”(《华盖集·十四年的“读经”》)总结中国“传统政治”的这种普遍性的特征,发见“硬化的社会”,“硬化”的“组织”的演变形式,以及大胆“妄行”的“聪明”的“分子”们的表现,“明白”其中的规律,也是有意义的学术课题。

# 千百年眼

## 皇权与吏治的历史扫描

目

录

- 中国古代“以德治国”的宣传与实践/ 1
- 《帝范》与《官箴》:中国古代执政者的自律规则/ 12
- 历史上的“德治”与“刑治”/ 27
- 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内在封闭性/ 34
- 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危局与战略对策/ 55
- 其兴也淳,其亡也忽:中国古代王朝盛衰的周期率/ 62
- 中国历代“官数”问题/ 77
- 中国古代的政治笑话/ 87
- “开会”的历史/ 91
- 秦代专制政体的奠基和“忠”的政治道德规范的定型/ 95
- 汉初查处官员非法收入的制度/ 110
- 汉代的行政监察形式/ 118
- 晚年汉武帝与“巫蛊之祸”/ 124
- 两汉政论家对浮侈世风的警觉与批判/ 133
- 唐人政治史意识中的“文景之治”印象/ 137
- 《资治通鉴》中的政治伦理与政治道德教义/ 148
- 商鞅的文化肖像/ 160
- 白描吕不韦/ 167

# 千 百 年 眼

## 皇权与吏治的历史扫描

### 目 录

- 秦二世悲剧/ 175  
贾谊政治思想的战略学意义/ 178  
汉武帝“冠于百王”的功业/ 187  
茂陵秋风客:武帝的“文采”/ 191  
“无道”的“歪皇帝”/ 195  
张骞和苏武:汉代外交的双子星座/ 201  
王莽的文化人格透视/ 205  
刘秀及其西部方略/ 208  
汉末“三李杜”/ 211  
诸葛亮的神话/ 214  
顾炎武的治官定律/ 217
- 千百年眼/ 221  
史家的“墨兵”/ 225  
科举制与中国士大夫/ 227  
外戚政治的历史回顾/ 230  
“厚黑”的历史文化解说/ 233  
“德治”的败局/ 239  
政治史的文化考察/ 241
- 后记:政治文化学的古今链接/ 251



## 中国古代“以德治国”的宣传与实践

回顾中国古代以专制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史,假若单纯从历代官方文献对于当时行政的记录看,可以说几乎都是“德治”的历史。如果我们检索所有的中国古代政治文书,“德”字的使用频率无疑是显著领先的。利用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采用中华书局标点本“二十四史”和《清史稿》制作的“瀚典全文检索系统”统计,在人们公认以政治史为主体内容的历朝正史“二十五史”中,“德”字的出现竟然多达 32453 次(“前四史”包括注文)。

显然,“德”久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系的主构架,而“以德治国”,也是千百年来历代王朝诸多执政者专意遵行的政治原则。而几乎所有的帝王,又都把“以德治国”作为自我肯定、自我美化、自我标榜的政治旗帜。考察有关现象,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认识,也有益于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。

### “为政以德”的原则

孔子的一段名言被记录在《论语·为政》开篇第一段。这就是: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孔子说,以“德”的原则执政,则一如北极星,自在其所,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。《左传·昭



明弘治刊本《历代古人像赞》孔子像

公五年》记载，孔子在论说“为政”的原则时曾经引述《诗经》：“《诗》云：‘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。’”所引诗句，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。据汉代学者郑玄的解释，是说国君如果倡行德治，“则天下顺从其政”。

孔子其他直接论及“德治”的语录，据《孔子集语·主德》所辑录，还有十余例。如《尚书大传》：“吾于《高宗彤日》，见德之有报之疾也。”《大戴礼记·主言》：“道者，所以明德也；德者，所以尊道也。是故非德不尊，非道不明。”同书《五帝德》篇回顾传说时代帝誉、尧、舜、禹的成功，也记录了孔子“其德巍巍”、“其德不回”、“其德不慝”的评价。同书《虞戴德》篇中，又可以看到孔子有关“用民德”、“正民德”的主张。当君主问政时，孔子的答复有“兴民之德”语。《诰志》篇又可见孔子对“舜治以德使力”的赞扬，而《用兵》篇又记载了孔子强调“德治”，以为“德”的文化影响可以十分久远的言论：“圣人爱百姓而忧海内，及后世之人思其德”，“永其世而丰其年也。”据说孔子还发表过这样的观点：“天子之德感天地，洞八方。以化合神者称皇，德合天地者称帝，德合仁义者称王。”（《初学记》卷九引《七经义纲》）

与孔子大致同时的子产作为春秋时期有作为的执政者，也曾经提出“为政必以德”的主张（《史记》卷四二《郑世家》）。他还曾经强调：“德，国家之基也。有基无坏，无亦是务乎！有德则乐，乐则能久。”（《左传·宣公二十四年》）可见，在相当久远的年代，所谓“为政以德”不仅已经形成政治理论，而且已经影响政治实践。

《左传·僖公二十四年》有“大上以德抚民”的说法，强调最高境界的

政治成功，是依靠“德”的宣传和实践来实现民众的顺从和社会的安定的。我们看到，在春秋战国时期，“德”，已经成为不同学派共同关注的政治文化命题，也成为不同学派共同高举的政治文化旗帜。《老子》以“道德”名篇，通称《道德经》，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《老子》，则是《德经》在前，《道经》在后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主张“以德服人”。《庄子·天下》强调“以德为本”。《管子·兵法》认为，“通德者王。”《荀子·议兵》也说，“以德兼人者王。”虽然诸子百家政治立场不同，文化倾向各异，但是对于以“德”作为政治主导的原则，看来基本上都是一致赞同的。



《三才图会》汉景帝像



《大戴礼记·少间》中曾经以孔子的口吻总结“古之治天下者”的成败,指出,古来政治的得失,都体现为能否重视“德”的作用。《史记》卷九《刘敬叔孙通列传》记载,西汉初年,有的政论家甚至还指出,“有德”和“无德”所导致的政治的成与败,竟然可以分别至于极端:“有德则易以王,无德则易以亡。”

“德”,长期被看做管理国家、统治天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法宝。唐初名臣魏徵曾经指出,“德”对于治国来说,是政治“根本”,是政治“泉源”。《旧唐书》卷七一《魏徵传》:“臣闻求木之长者,必固其根本;欲流之远者,必浚其泉源;思国之安者,必积其德义。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,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,德不厚而思国之治,虽在下愚,知其不可,而况于明哲乎!人君当神器之重,居域中之大,将崇极天之峻,永保无疆之休。不念于居安思危,戒贪以俭,德不处其厚,情不胜其欲,斯亦伐根以求木茂,塞源而欲流长者也。”这种见解,在中国古代执政者和政论家的心目中,是得到广泛认同的。“以德治国”,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之一。

回顾历史,应当说,所谓“德政”与暴政相比,可以给予民众以较宽松的生存空间,给予社会以较有利的发展条件。历史上多次形成的所谓“盛世”,常常是执行“以德治国”的原则,成功地调节阶级关系,完善社会秩序,而终于得以实现的。《史记》卷一〇《孝文本纪》这样赞美文景之治的成就:“汉兴,至孝文四十有余载,德至盛也。”《新唐书》卷二《太宗纪》如此颂扬贞观之治的成功:“自古功德兼隆,自汉以来未之有也。”这些对于政治史的评论,都发现和总结了历史上“以德治国”的成功经验。

## 明暗两样的“以德治国”

白居易《青石》诗有“官家道傍德政碑,不镌实录镌虚辞”句(《白氏长庆集》卷四)。考察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有关现象,应当冲破表征透视其真质。正如鲁迅所说,历史上“人的言行”,在明处和暗处,“常常显得两样”,古来帝王们炫示“德治”的种种政治宣传,其实往往是“黑暗的装饰”,“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,是鬼脸上的雪花膏。”(《准风月谈·夜颂》)

秦王朝以行政暴虐著称。自两汉以后,秦王朝的政治形象,已经定格于“暴政”。但是我们在考察秦政治史时可以看到,秦王朝的当政者在推行暴政的同时,则以“德政”进行自我粉饰。在“秦暴”批判的对立面,我们也看到“秦德”的宣传。其突出实例之一,即所谓“秦皇帝东巡狩,至会

稽、琅邪，刻石著其功，自以为过尧舜统”。从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的记载可以看到，“刻石著其功”，据主持其事的秦王朝重臣自称，作“诵功”，“诵烈”，“诵圣烈”，又有直接强调“德”的宣传，写作“诵功德”，“诵皇帝功德”，“称成功圣德”，“章”，“成功圣德”，“立石刻颂秦德”的。西汉政论家贾山在《至言》中以所谓“秦皇帝计其功德，度其后嗣，世世无穷”同所谓“尧舜禹汤文武纣世广德以为子孙基业”相对比，指出后者可累世绵延至于数十代，而前者“身死才数月耳，天下四面而攻之，宗庙灭绝矣”。在贾山笔下，两种“德”，一种是自诩的“德”，伪装的“德”；一种是公认的“德”，真正的“德”。各自不同的历史结局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西汉末年，社会危机严重。王莽在复杂的贵族宗派斗争中，以矫情伪饰的手段取得高位，后来成为新朝的皇帝。考察王莽 68 年的政治生涯，表面看来，是始终遵循“德”的原则的。《汉书》卷九九《王莽传》正文中所见“德”字多至 93 例。所说“威德日盛”，“功德烂然”，“圣德纯茂”，“至德要道，通于神明”等等，都是当时人对王莽正面的颂扬。而尽管其言行时时处处以“德”为标榜，对照当时政治形势的昏暗，可以清晰地透见这种宣传的虚伪与无聊。直到民众暴动的烈火延烧入宫，王莽仍然模仿孔子故事，宣称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汉兵其如予何！”（《汉书》卷九九下《王莽传下》）对于这种借用“德”以自欺欺人的伎俩，后世历史评论家曾经轻蔑地斥之为“笑话”（〔明〕李贽：《史纲评要》卷九）！

回顾历史，距离理想的“德”十分遥远的暴虐的帝王、昏庸的帝王、荒淫的帝王，都不愿意舍弃“德”的旗帜。凡在他们当政的历史时期，文字遗存中可能更多见极端无耻的“以德治国”的自我炫耀之词。

即使是专制时代的“英德之主”、“圣德之主”，在有真正实效的德政之外，也喜好妄自夸饰的“德”的宣传。例如，贞观二年（628）京师发现蝗灾迹象，唐太宗竟手捉蝗虫而吞食之，宣称：我宁愿让你食我的肺肠，也不愿让你食百姓之谷粮。李贽《史纲评要》就此批注“沽名”。贞观十二年（638），唐太宗令将魏徵包含政治批评意见的奏疏列于屏障，并录付史馆，宣称以此“使万世知君臣之义”。李贽又有批注“太宗倒底有沽名之念在”。唐太宗问记录自己言行的《起居注》的执笔者褚遂良：朕有不善，卿也记录下来吗？李贽又批注“太宗好名之心，逗漏于此矣”。唐太宗看到记载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自己杀害兄弟的情节语多微隐，对房玄龄说，古时周公杀管叔、蔡叔，是为了安定周室；季友鸩杀叔牙，是为了保存鲁国。我的行为也大体相类。史官不必忌讳，可以削去浮辞，直书其事。李贽批注“若无周公、季友在前，决要删去矣。好名者之心固如此”。李贽



还写道：“读史至唐文皇，亦觉心开目明。其从谏处虽出好名，正所谓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也，不犹胜于愎谏者耶？”说唐太宗的“从谏”出于“好名”，有表演性质，但是毕竟优于根本拒绝谏言的刚愎之主。而夏商周以来的帝王，其实没有不“好名”的（《史纲评要》卷一八），李贽所指出的以“德治”表演博取“浮辞”的“好名”、“沽名”的动机，是我们在读史时可以时常发现的。

有的西方史学家曾经指出，在中国古代，“国家的主宰们由于掌握着集权力量，所以很容易维持最适合统治者的宣传条件。”“专制者可能把他们的政权描述为仁慈的政权，但是实际上，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，他们也总是力求达到对自己最适宜的，而不是对人民最适宜的理性条件。”这种政治体制的特征，“是仁慈的形式和暴虐的实质。”论者分析了“仁慈神话的双重作用”，指出：1. 它强调专制政权的长远利益；2. 它削弱潜在的反党派；3. 好皇帝和清官不能扭转风气（〔美〕卡尔·A·魏特夫：《东方专制主义：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》，徐式谷等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，第132页至134页）。这里所谓“仁慈神话”，不妨译读为“德治神话”。所谓“仁慈的形式和暴虐的实质”，或许也可以译读为“德治”是其表面的形式，“暴政”是其真实的本质。



### “德治”与“法治”

在专制时代，帝王将相们有关“以德治国”的言行，有时确实能够体现出比较清醒、比较开明的政治意识。但是在政治生活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时代，如果简单生硬地移用这种政治观念，则未必能够合于历史的潮流。

鲁迅曾经说：“不错，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，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，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，为民众本身的，却一点也没有。这就是‘礼不下庶人’。”（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）中国古代“权势者”们“计划”的目的在于“为了治民众者”的“出色的治国的



唐太宗李世民

方法”，在民主政治已经相当成熟的今天，当然只能作为政治设计和政治建设的参考。

《左传·成公十七年》：“德刑不立，奸轨并至。”说“德”“刑”并用，很早已经成为执政的原则。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写道：“德莫厚焉，刑莫威焉。服者怀德，贰者畏刑。”如果在“德”与“刑”之间或者“德”与“法”之间进行治国基本原则的择定，其实是应当进行认真思考的。

在中国古代，有关“德”与“法”对于治国的作用，曾经有过理论上的比较。

《吕氏春秋·上德》所谓“先德后武”，已经体现了“德治”优先的倾向。朱熹在注解孔子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的原则时，也说，“愚谓政者，为治之具。刑者，辅治之法。德、礼则出治之本，而德又礼之本也。”认为“刑”是实现“治”的辅助方式，而“德”则是实现“治”的根本的根本。

据《新唐书》卷一一二《韩思彦传》记载，当时曾经有人发表这样的政论：“国安危在于政。政以法，暂安焉必危；以德，始不便焉终治。夫法者，智也；德者，道也。智，权宜也；道，可以久大也。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。”认为如果为政以“法”，则虽然暂时安定而终将危殆；而为政以“德”，则起初有所不便而终将实现大治。“法”，是权宜之计；“德”，是永久的原则。所以，以“法”治国，是国家的祸害；以“德”治国，是国家的福庆。这样的观念，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，是有权威性的影响的。这种认识的根源，可以追溯至《论语·为政》所记载的孔子的话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

有的学者在分析中国历史文化时曾经指出，“凡是官僚体制能够起支配作用的地方，受关注的不仅是形式上去完成法律规范（Rechtsnorm），更受注意的是其实质的‘公道’，的确，这种‘公道’可与官僚体系的内在伦理（Ethos）相符。”“因此，不仅形式的法学未能发展，而且它从未试图建立一套系统的、实在的、彻底理论化的法律。”（〔德〕马克斯·韦伯：《儒教与道教》，洪天富译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，第175页）这里所谓“公道”，有与“德”大致近似的涵义。中国古代政治观念中的“法”与现代意义的“法”有根本的不同。但是分析自古以来重“德”而轻“法”的思想倾向及其影响，对照政治文化的若干现状，依然可以看到历史传统的惯性。

今天许多学者对于“法制”和“法治”的区别有所关注。其实，在中国古代政治观念中，“法制”和“法治”严格说来并没有本质的差异。这是因为近代“法治”的思想不可能在当时的背景下自然生成的缘故。不过，在



记录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文献遗存中,确实“法治”之说远远少于“法制”。在《四库全书》中,“法制”出现4571次,“法治”只出现2218次。

儒学经典中,《礼记·月令》有“修法制”的说法。而“法制”之说更多见于比较注重政治实践、政治实务、政治实用、政治实效的一些思想家的论著中。如“法制”一语在《管子》中出现20次,在《商君书》中出现7次,在《韩非子》中出现4次。这一现象或许可以给我们以某种启示。“法制”的直接意义,是指法令制度以及因此建立的社会秩序。《后汉书》卷四九《仲长统传》:“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,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。均是一法制也,或以之化,或以之乱,行之不同也。”认为君子使用法制则可以实现“治”,小人使用“法制”则可以导致“乱”。同样都是“法制”,结果或“治”或“乱”,是因为“行之不同”的缘故。推行同样的“法制”,会有不同的政治前景,归根结底,仍然决定于因“德”而决定的“君子”“小人”之分。



《三才图会》汉武帝像

《管子》和《韩非子》又都曾经提出过“以法治国”的主张。然而如《管子·明法》所说,所谓“以法治国”,最终将实现这样的政治境界:“主虽不身下为,而守法为之可也。”可见,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体系中,“主”,其实是既在“法”之外,又在“法”之上的。又如《韩非子·有度》虽然强调“法不阿贵”,主张法的施行,对于大臣和匹夫应当都是一致的,但是又说道:“法审则上尊而不侵,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。”“法”的明确,在于维护最高执政者的地位,“上尊”,“主强”,得以“不侵”,得以“守要”,这就是“法”的主要功用。这就是中国专制时代“以法治国”的实质。

在中国传统政治语汇中,确实也曾经有“人治”的说法。但是当时所谓“人治”,与今人理解的与“法治”对应的“人治”有所不同。中国古代通常所说“人治”,是指“人”的管理,即以“德”的准则来约束民众,治理国家。《礼记·大传》和《仪礼·丧服》都有“名者,人治之大者”的说法,汉代大儒郑玄解释说:“人治,所以正人。”“人治”之本,也依然是“德”。

## 关于“德本财末”

讨论“以德治国”这一命题,还应当指出,“德”按照通常的理解,属于社会道德范畴、精神生活范畴、意识形态范畴,而“德”和与之对应的属于经济生活范畴、物质生产范畴的社会文化内容的关系,也值得我们注意。

儒学经典中强调“德本财末”的原则。以为治国平天下,“德”是根本,而理财只是末事。有关“财”的经济行为被置于极次要的地位。《礼记·大学》说:“德者,本也;财者,末也。”唐代学者孔颖达解释说:“‘德’能致‘财’,‘财’由‘德’有,故‘德’为本‘财’为末也。”在这样的原则下,面对“德”,有关“财”的经济行为被置于极次要的地位。“德本财末”,并不仅仅是说“德”可以致“财”,“财”应当归于“德”。在中国传统政治意识中,常常基于这种“本末”观念形成极其生硬的对“德”绝对重视,对“财”绝对轻视的理解。这种观念千百年来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,不仅作用于文化价值的取向,也作用于政治历史的走势。

汉武帝时,任用理财能臣桑弘羊,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,使国家的财政危机得以解除。但是桑弘羊推行的有效的经济政策,受到传统儒学“德治”原则的坚持者们的激烈的抨击。《盐铁论》记录了有关的辩论。桑弘羊的反对派一开始就提出了“德本财末”的原则以为理论旗帜:“治人之道,防淫佚之原,广道德之端,抑末利而开仁义,毋示以利,然后教化可兴,而风俗可移也。今郡国有盐铁、酒榷,均输,与民争利,散敦厚之朴,成贪鄙之化。”(《本义》)他们还强调:“古者,贵德而贱利,重义而轻财。”(《错币》)以此作为千古准则,又提出这样的要求以规范社会:“贱货而贵德,重义而轻利。”(《世务》)要知道,这种“贵德”“贱利”,“贵德”“贱货”以抬高“德”而压抑“财”,即崇尚空洞的政治宣传而贬低具体的经济运作的倾向,在这里并不是要影响个人的社会行为,而是要改变国家的基本道路。如果译成近似的现代语,这样的观点,与所谓“宁要某某主义的草,不要某某主义的苗”的宣传十分相像。

所谓“德本财末”,确实也可以看做“重义轻利”观念的放大。其区别在于,作为价值取向来说,后者是就修身而言,前者是就治国而言。从这一角度分析,我们可以认识到,对于传统“以德治国”的原则如果作简单的片面的理解,那么,和现代市场经济也是格格不入的。







## “以德治国”政治文化涵义的三个层次

曾给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深远影响的所谓“以德治国”，其实有多重的文化内涵。

“以德治国”的第一层含义，是说执政者应当重视自身“德”的修养，如王守仁《传习录》卷上所谓“涵泳德性”，行为操守以“德”为准则，方能够具备治国的资格，取得治国的成功，反之，如《易·系辞下》记载孔子所说，“德薄而位尊”，则“不胜其任”，而且很少能够不遭遇灾祸的。

“以德治国”的第二层含义，是说执政者应当推行以宽仁和善为原则的德政，如《尚书·盘庚上》所谓“施实德于民”，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所谓“出德号，省刑罚”，如此方可以成就治世。

“以德治国”的第三层含义，是说对执政者应当以“德”为规范有效地约束被统治者的思想和言行，如《论语·颜渊》中孔子所谓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”。

这里所说到的几种涵义，儒家正统学说中的理想的“德治”，其实应该三者兼而有之。可是中国古代大多数帝王对于“以德治国”的理解，基本上只停留于第三层涵义。《韩非子·难一》引仲尼之说，对于舜的行政风格，有“圣人之德化”的感叹。《管子·君臣下》所说的“道德定于上，则百姓化于下矣”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接近这一思想。在中国传统政制形态的框架内，“道德”是“上”“定”的，作用在于教化和规范居于“下”的“百姓”。通常所谓“以德化民”（《史记》卷一〇《孝文本纪》），比较准确地体现了这种政治意识。《孟子·离娄上》中已经可以看到“沛然德教溢乎四海”的理想，而这种“德教”其实有相当严酷的形式。如《大戴礼记·虞戴德》中所见孔子的主张：“愚民曰奸，奸必诛。是以天下平而国家治，民亦无贷。居小不约，居大则治；众则集，寡则缪；祀则得福，以征则服；此唯官民之上德也。”也就是说，理想的政治秩序的维护，依赖“君”对于“民”之因“德”以“治”，其极点，可以至于“诛”。这些方式的合理的运用，体现了“官民之上德”，即管理民众的最高境界的“德”。

然而事实上如果说“以德治国”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有益的积极的历史影响的话，主要却是因为基于“以德治国”的第一层含义。执政者施行着某种道德自律，接受着某种道德监督，从而有益于成就治世。《贞观政要》第一篇《君道》开头所引录唐太宗李世民的言论：“若安天下，必须先正其身，未有身正而影曲，上治而下乱者。”以及魏徵随即发表的对于